

● 教育学

中国科举考试产生与持续发展的原因探论

刘亚敏¹, 胡甲刚²

(1. 武汉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2. 武汉大学 法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刘亚敏(1976-), 女, 湖北武汉人, 武汉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 教育学博士,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研究; 胡甲刚(1975-), 男, 湖北丹江口人, 武汉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博士生, 武汉大学研究生院职员, 主要从事宪法学和高等教育学研究。

[摘要] 科举考试的产生与持续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科举考试促进了依附于皇权的职业官僚系统的形成, 满足了封建专制不断强化的需要。儒家思想催生了科举考试, 科举考试的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科举考试有利于安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形成, 为封建农业型自然经济的发展创设了必要条件。

[关键词] 科举考试; 封建专制; 儒家思想; 自然经济; 原因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6-0795-05

科举考试为中国所独创, 且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科举考试之所以生生不息, 绵延不绝, 实为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 要揭示中国科举考试产生与持续发展的原因, 则必须从中国科举考试所植根的社会土壤入手。

一、封建专制政体不断强化的需要

秦始皇统一六国, 标志着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皇权主宰地位的建立。后随历史的推进, 君主专制集权日益强化。显然, 单以帝王一人之精力, 去治理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度的庞杂政务, 是决不可能的。其专制政体的推行, 必须建立一支效忠皇权、奉命行事的职业官僚队伍。但是, 在科举考试之前所实行的各种选官制度(察举制、九品中正制), 在很大程度上妨碍着效忠于皇权的职业官僚体系的形成。由于官员选任缺乏严格的客观标准, 对这些标准的掌握和最后选任的结果, 只能依赖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选任权掌握在哪些社会力量手里。人才的荐举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 而当时的政治权力并不能直接到达社会基层, 即使是在皇权和官僚系统最有效的时候, 他们也无法控制举荐的整个过程, 特别是在基层荐举的过程。这就为地方上贵族力量的介入提供了可乘之机。至东汉, 官员的选荐已成为豪强大族扩展自己势力的手段, 其结果是皇权失去了自己的工具, 所选的官员不是听命于皇帝, 而是依附于世家大族, 皇权被崛起的贵族势力所架空。于是, 皇权的衰败和豪强势力的崛起导致了几百年的分裂和战乱。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为中正职务事实上被少数豪门大族所把持, 由此产生的官僚系统疏远皇权而靠拢贵族, 政权实质上掌握在贵族实力派手中。君主成为傀儡, 甚至在适当的时机被取而代之。“变相世袭的九品官人制已经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1] (第103页)

从东汉到隋末统一前几百年的战乱和分裂给皇权的拥有者以极深的教训。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官员的选任问题,就无法建立起绝对效忠于自己的职业官僚系统,就不能消除来自上层社会对大一统皇权的威胁和挑战。隋代统治者在结束分裂局面、重新完成统一大业后,为适应中央集权专制的需要,打击贵族势力,遂摈弃旧法,创立了为自己所能控制的科举考试制度。从此,科举考试登上了历史舞台,为历代封建王朝所继承、发展。科举考试制度的确立,使选士有了比较明确的评判标准,强化了皇权对官员任选过程的控制。同时,“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科举考试,使职业官僚的来源越来越操纵在皇权手中。“官职的世袭越是困难,世宦贵族就越是难以形成,官僚系统越是会依附于皇权。”^[2](第 132 页)正由于此,王亚南把科举考试视为“支持官僚政治发展的一大杠杆”。由此可以看出,科举考试制度可视为封建君主专制集权高度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推动了专制集权走向极端。而封建专制政体的强化,反过来使科举制度愈来愈完备。“科举限制愈严,竞争愈烈,而其对思想统制,亦愈易就范;对上级官僚,亦愈易卑躬屈节表示真诚。”^[1](第 106 页)吴晗先生曾用生动的语言描述过这一过程:在宋以前,有三公坐而论政的说法,也就是说,大臣在皇帝面前是可以坐着的;而到了宋朝,三公群卿就只能立而论政了;到了明清时代,不但不许坐,连站都不行,得跪着奏事了^[3](第 51 页)。由坐而立继而跪,标志着官僚政治地位的下降和对皇权依附性的增强,同时也意味着皇权的上升和扩张。此外,科举考试也有效地笼络了知识分子,为广大士人敞开了入仕之门,削弱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有利于封建专制的巩固。乾隆三年(公元 1738 年),统治阶级内部就是否实行科举的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当时的执政大臣鄂尔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4](第 133 页)科举考试自产生后,就一直为历代统治者所沿用,只是为了使职业官僚体系更加依附于皇权,并日益削弱官僚阶层的独立性。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不时对科举考试制度加以革新和完善,使科举考试的管理权逐步向上集中,组织流程、防范措施愈来愈严密。

总之,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借助科举考试塑造了一个脱离狭隘地域、家族利益、武装实力、依赖于皇权的职业官僚系统,从而加固了封建专制政体。同时,封建专制政体的不断强化,又进一步加深了对科举考试的控制。

二、儒家思想主导地位日益加固的影响

在阶级社会,把握社会物质基本生产手段的阶级,也必然要占有或支配社会基本的精神生产手段。封建君主专制的建立和巩固,还要有意识形态的支撑。在封建专制时代,以整合学说为基本内容的儒家思想,是最适合专制政体的需要的。首先,天道观念以及“君权神授”学说为大一统的皇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同时又给皇权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使广大民众对皇权产生了敬畏感。其次,大一统的观念为大一统的政治权力提供了合理性解释;以伦理纲常所确立的社会等级秩序,便为君权增添了道德上的神圣性。正因为如此,儒家思想在封建专制确立后,借助国家政权的行政力量,很快由原来的百家之一而变为官方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通过对皇权的神化和社会等级秩序的建立而服务于皇权,成为大一统皇权的基本支柱之一。如果说皇权是这个社会中的硬结构,儒家思想则成为与这个硬结构相联系的软组织。然而,在隋唐以前,皇权和儒家思想的一体化,并没有一种制度化的保障。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家玄学和佛教思想的兴起,就说明此前儒家思想与皇权的结合还远非牢固。而科举考试的施行,则从制度上解决了这两个中心的一体化问题。科举考试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大一统的皇权服务的,肩负着选拔人才和传播意识形态的双重任务。所以,科举考试一产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自然而然地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大一统的皇权就与儒家思想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考试面前一律平等”,科举制在理论上将参政权向大多数人开放。从隋唐到明清,报考的限制越来越少。这就为平民子弟凭自己的真才实学进入社会上层敞开了大门。而要参加科举考试,则必须钻研、学习儒家经典。这样,儒家思想就借助科举考试在整个社会传播开来,渗透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整

个社会惟一的主导思想,其价值规范在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普及。“士人为应试而浸淫于儒家经典的过程,自然成为知识分子学习以儒家经典为立身的标准的社会化过程。”^[5](第12页)士人的儒化和儒士的官化顺理成章地展开了,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政治伦理遂一统天下。考生从事科举考试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接受效忠于皇权制度的教育和洗礼。“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制度和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6](第61页)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在封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日益加固,便决定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必须统一于儒家经典。

儒家学说在封建意识形态中主导地位的确立,也使其思想精髓在社会上广泛传播,渐为世人所认同、所向往。其中,“有教无类”和“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对科举考试的产生与持续发展有直接的作用。

“有教无类”是指教育向全社会开放,任何人,不论智与愚,贵与贱,尊与卑,都有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这种观念明确反对统治阶级对教育的垄断,要求教育也应为贫苦子弟服务。基于平等主义理念的“有教无类”的观念,为封建教育的大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中,不仅有中央官学、地方官学,而且还有大量私学,形成了颇具规模且上下贯通的教育系统,为世界各国封建时代所远不能及。大量私学的设立使平民子弟接受教育成为可能,同时也为官吏选拔建造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库”。没有一定规模的教育,没有相当的人才储备,科举考试的选才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学而优则仕”则是指学识高、才能著者方能做官,这一观念明确要求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政治人才。而选用政治人才的标准主要在于“学优”,而不在于门第的高低、出身之贵贱。“学”与“仕”的结合,“选优”标准的确立,为士人向学提供了巨大的原动力。在官本位的中国封建社会,只有入仕,才能享受俸禄,才能获得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这就驱使士人醉心于读书做官。

虽然“有教无类”和“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产生的时间很早,但直到隋唐之前,这两种观念仍然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仍然停留于观念范畴,在现实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读书与做官之间缺少“考试”(相对客观的量尺)这一关键环节,从而使“选优”的目的落空。所期望的以才识的高低作为选官的标准,在现实中却被出身、血缘、门第等先天性因素所替代。官僚世袭制虽被废除,但官僚的世袭化倾向却依然存在。而官僚变相的世袭化又阻塞了社会下层合法进入社会上层的惟一通道,从而间接影响了士人求学的积极性,最终也阻碍了“有教无类”的实现。然而,历史潮流是不可遏抑的,由于“有教无类”和“学而优则仕”顺应了社会发展的取向,随着科举考试的产生,使士人的才学有了客观衡量的标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选优”的目的得以真正实现,读书、应试、做官则形成了一个有机结合、有序衔接的链条,育才(教育)、选才(考试)、用才(任用)三个子系统始得以相互促进、协调运行。

“有教无类”的主张,其重心在于让社会下层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学而优则仕”则在于从读书人中选拔优秀者充任国家官员。也正是在这两种观念的影响下,不仅直接推动了科举考试的产生,而且也使科举考试的生命之树常青。

三、维持农业型自然经济稳定发展的客观要求

尽管中国封建制经济结构由多种经济成分所组成,但不容置疑的是农业在整个经济结构中的核心地位,起着支配性作用,畜牧业、手工业、商业等经济门类不过是农业的补充,并且农业基本上在自给自足的轨道上运行。由于农业是国家命脉之所在,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关系到王朝的兴衰和更迭。所以,历朝历代统治阶级都把重农抑商定为国策。而中国的农耕区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平地少,山地多,土壤肥力不足,降雨量变化很大,自然条件并不优越,加之农业工具不发达,农民只有靠艰辛的劳动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经济承受能力十分脆弱,经不起残酷的盘剥。过度的压迫和剥削,在危及到广大民众的生存时,必然会引起民众强烈的反抗,从而迫使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以农为本,以民为

本。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封建地主所有制, 田地为大大小小的贵族、地主所占有, 农民主要靠租种地主的土地谋生, 辛勤劳动的成果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都要无偿地交给地主。农民感受到的直接压迫来自地主, 而不是皇帝。所以, 广大农民希望有一个英明的君主来制约贵族、地主, 迫使他们减轻压迫。而农民生活境遇的改善和农业的持续发展, 无疑有利于封建君主专制的稳固。总之, 不管是君主, 还是农民, 都希望建立一种制度, 通过这种制度使贵族、地主的势力受到抑制, 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促进农业型自然经济的发展。另外, 农业的持续发展还需要一支效忠于皇权、精明强干、体察民情的官僚队伍, 以切实担负起君主所委托的治理地方的任务, 使整个国家行政系统有效运行。然而, 这些条件在科举考试实行以前的中国封建社会, 始终没有一种制度上的保障。首先, 当时的选士权为贵族、门阀所控制, 血缘、出生、门第、家世等先天性因素在官员选拔中占据支配地位。以此种手段所选拔的官员, 很难担起治理地方的重任。其次, 世家大族通过对官僚职位的变相垄断和直接控制, 在客观上有利于形成依附于世家大族而敢于同皇权对抗的官僚集团, 这无疑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当豪强集团势力羽翼丰满时, 就很可能与皇权发生激烈冲突, 甚至导致社会动乱。失去了社会安定这一基本前提, 农业型自然经济的稳定发展将成为一句空话。最后, 皇权与下层民众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 民情、民意很难上达, 而皇权的统治也很难越过贵族和官僚直接深入到社会下层。这不仅会妨碍中央农业发展政策和措施的制订与实施, 而且也会淡化普通民众对皇权的顶礼膜拜, 从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也不利于农业型自然经济的持续发展。

科举考试的推行, 使这一局面大为改观, 为农业型自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必备的条件。第一, 科举制的施行, 使贵族势力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挑战君权、造成社会动荡的不稳定因素大为减少。“科举制犹如一架庞大的转盘, 搅得社会上下流动出现朝为匹夫而暮为高官, 父为高官而子为匹夫的状况, 而唯独转盘的中心——皇权是相对稳定的。”^[7] (第 444 页) 科举考试的开放性, 一方面中断了官职的世袭, 造成了贵族势力的没落, 消除了挑战皇权的社会力量; 另一方面一般平民知识分子通过公平竞争而成为官僚系统的成员, 从而使皇权直接深入到中下层社会, 扩大了君主专制的社会根基, 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有利于农业型自然经济的持续发展。第二, 科举考试的施行, 选拔了一批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的官员, 提高了整个国家官僚系统的行政效能。作为一种开放性的考试, 历代科举除了限制极少数人报考外, 绝大多数人皆可自由报考。而科举录取名额是极为有限的, 科举考试的竞争十分激烈。如果不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 就会被层层科考所淘汰。“科举具有一定的智力测验性质”^[8] (第 426 页), 天资聪慧且文化基础知识厚实的士人才更有可能一举成名, 从而进入国家官僚系统。所以科举考试的筛选功能, 从整体上提高了封建官僚的文化素质, 为行政效能的提高奠定了文化基础。另外, 科举考试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内容。士人在入仕前, 必须数十年地刻苦攻读、认真领会儒家经典, 而儒家经典中的忠君、爱民、仁义理智信、伦理纲常、修齐治平等观念和道理, 在漫长的学习中, 也会逐渐凝固为士人的智能结构, 影响士人的日常行为。一旦入仕做官, 儒家思想中积极、正面的影响会增强他们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较之世袭官僚更为专注于政务, 励精图治, 体察民情, 从而有助于提高封建国家机器的效率, 为农业型自然经济的发展创设了必要的政治环境。第三, 科举考试导致统治阶级内部成员经常不断地更新, 使社会上下层在和平与合法的状态中经常不间断地对流, 相对缓和了社会矛盾, 保持了封建官僚系统相对的活力。因此, 尽管封建王朝相更迭, 但封建中国的社会实体却依旧继续延伸。由于不少官员来自贫苦家庭, 对农民的疾苦有切身的体会。他们作为当政者, 不仅更为熟悉农村的境况,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会考虑到农民的利益, 有的官员甚至会充当为民请命的代言人, 有利于减轻中央和地方对农民过度的压迫和剥削, 也对农业型自然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封建农业型自然经济的持续发展, 需要科举考试为其创设安定的社会环境和适宜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 正是封建统治者对农业型自然经济的刻意维持, 才使科举考试生生不息, 前承后继, 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盘踞达 1300 余年。

综上所述中国科举考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政治、经济和文化高度发展的历史产物, 而中国科

举考试一经产生, 则不仅成为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 而且还成为推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机制。

[参 考 文 献]

- [1] 王亚南. 中国官僚政治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 [2] 孙立平. 论科举制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的影响[J]. 学习与探索, 1992, (4).
- [3] 吴 晗, 费孝通. 皇权与士绅[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
- [4] 王道成. 科举史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5] 萧功秦. 从科举制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J]. 战略与管理, 1996 (4).
- [6] 秦 晖. 从科举官僚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J]. 战略与管理, 1996, (6).
- [7] 刘 虹. 中国选士制度史[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2.
- [8] 刘海峰. 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责任编辑 涂文迁)

Research on the Reason of Chinese Imperial Examination Came into Being and Continually Development

LIU Ya-min¹, HU Jia-gang²

(1.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2.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LIU Ya-min (1976-), female, Doctor, Lecturer,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HU Jia-gang (1975-),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Wuhan University Law School, majoring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 of constitution.

Abstract: Imperial Examination's generation and continual development was the result of Chinese Feudal Society multiplicate factors synthetical function,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Imperial Examination proceeded the professional bureaucrats that leeches on to the imperial power to come into being, and met the need of Autocratic Feudalism enstrengthening. Confucianism promoted imperial examination's midwifery, and imperial examination ulteriorly reinforced the dominant status of confucianism. Imperial examination was favor of the stable social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appearing, and provided the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feudal agricultural natural economy development.

Key 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 autocratic feudalism; confucianism; natural economy; reason